

難忘的兩次意外折磨

海軍工作四十年

● 楊元忠（前東南長官公署副參謀長、海軍總部副參謀長、海軍元老）

緒言

海軍人事壁壘分明

對日抗戰勝利以前，我一直在海軍工作，與軍政部長陳誠將軍不但沒有發生任何關係，連面都沒有會見過。

那個時期的海軍，先是分為「中央海軍」、「東北海軍」及「廣東海軍」三個部門，各不相屬，北伐完成之後，政府為要統一海軍，乃指派曾在廣州隨孫中山先生工作的海軍前輩歐陽格將軍，於民國廿二年在江陰創辦與海軍官校相同的「電雷學校」，以為統一海軍的基礎。但該校沒有辦得好，辦了四年就結束了。海軍的人事就變得更為複雜，而成為壁壘分明的四個派系。

我與陳誠將軍的關係

表現優秀長官重用

抗戰勝利，政府決心整頓海軍，乃由當時的軍政部長陳誠將軍，在軍政部中增設「海軍處」。陳將軍兼任處長，並從現役的海軍軍官中，挑選周憲章上校擔任副處長，另外挑選林祥光、高如峰、魏濟民與我四位中校，分擔處內各組的主管，以便於還都南京時，將中央海軍陳紹寬上將所主持的海軍總司令部接收過來。這五人中，祇有我是東北海軍官校出身。其餘四人，都是中央海軍官校出身，而且都留學過英國海軍學校，我因為不是中央系統的軍官，就沒有留學的機會。但是，第一：

我入東北海軍官校，從入學考試到四年學

科畢業，都是第一名。同班的優秀同學中，一位東北人江金銘，於日本人在瀋陽所辦的「南滿醫科學校」的預科就讀，還拿的有獎學金。當時一般人都稱他為「東北才子」，但是該校的主要基本學科是生物、化學及日文，而海軍官校卻重視數學、物理及英文，所以四年之中，他最高的名次祇是第二名而已。因此我在東北海軍尉級軍官中，名望相當高。

第二：一九四一年，日本海軍襲擊美國的珍珠港。我國為與美國協同對日本作戰，乃決定在駐美大使館中設立海軍武官處。選定曾留學日本海軍官校、海軍參謀學校，並在抗日戰爭之前，擔任駐日海軍武官的劉田甫少將為駐美海軍武官。東北海軍首長沈鴻烈將軍對劉少將的才能知道得很清楚，乃向蔣中正委員長力薦我擔任

中校駐美副武官。我到美國不久，美國政府就成立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我探聽到加拿大及巴西等國，都在利用租借法案向美國借艦參戰，乃去美國海軍部見「戰備處」的處長，說明我國海軍官兵因沒有軍艦，都在閒散中，希望美國撥借給軍艦，使他們能以參加對日本作戰。當時就商定美海軍撥出護航艦八艘給我國。但需要我國向美國發出正式申請函，他方能辦理，我就據此向劉田甫武官報告。劉武官是我國官場中的老官僚。他的服務原則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不是政府要他做的事，最好不做。因此他對我這一報告，毫無興趣。

湊巧得很，過了沒有幾天，政府就因事召他回國一趟，我乃趕快把這借艦案寫成報告書，交給劉武官帶回去呈報駐外武官的頂頭上司軍令部。稍後我知道劉武官並沒有將這份報告呈報。這時我是代理武官，乃等到劉武官離開重慶之時，把本案付郵。延期數月，終告成立。

我海軍中許多人都知道此案發展的經過，對我發生很好的觀感。有這兩點，我方成為陳部長辭公所選海軍五位主要幹部之一。

創辦新制海軍官校

抗日戰爭勝利後，軍政部海軍處還都南京，接管陳紹寬所掌握的業務。海軍處的業務，因此擴大了很多，乃改稱為軍政部海軍署。（民國三十五年夏又改稱海軍總司令部。）我被派為接管廣東全省與香港及越南河內的敵偽海軍物資的專員。那時海軍軍官復員的人數還不夠多，要我管這麼大地區的物資，祇許我從南京帶兩個助手去，我對廣東當地海軍軍官的人事，非常之生疏，沒有把握做得好，就一再堅辭。最後獲准，改派去上海接收汪政權的海軍學校，創辦新制的海軍軍官學校，照例由蔣委員長（中正）為校長，我則以教育長名義主持校務。校中職員，大多數是就地招調，祇有預財部門的主管，是由海軍總部主管財務與補給的第四署派員擔任。那時候第四署的署長，是非軍人的吳子漪。據說他是陳辭公的內兄。陳辭公原配夫人姓吳。聽說吳子漪對第四署的人員說：「海軍官校的楊教育長是不貪污的。他如來請款，可全數照給。」那個時期，通貨膨脹得非常厲害，軍公人員的待遇，變得非常之低。一般做主官的，大都變相挪

點公款來改善私人的生活，我則因做了幾年的駐美副武官，積剩了一些美金，可以拿點出來補貼。

到台灣之後，局勢穩定，就買點房屋出租來彌補。因此我一直祇拿薪俸的海軍高級軍官。我想吳署長很可能對陳辭公提過我的操守。陳辭公對我相當信任，諒必與此有關。

陸軍高級軍官掌海軍

當年我國基於租借法案，向美國海軍申請撥借八艘軍艦，是於一九四三年就已經定案。我國選派來美受訓接艦的官兵一千多名，於一九四四年方離開重慶，飛越駝峰，到印度的加爾各達，搭美國海軍的運輸艦，來美國東岸的邁阿密（MIAMI）集訓。其中階級最高的，是「太」字級的艦長，海軍少校。因此帶這一千多名官兵的隊長，必須是海軍中校以上的軍官。當時我國政府，不曉得為甚麼，竟選了陸軍黃埔第一期出身的潘佑強中將為隊長。他亦覺得來美國官階不宜太高，乃改穿陸軍少將服裝。因他不會英文，就加派當時在委員長侍從室服務的海軍中校魏濟民為副隊長，政府並加派亦在侍從室服務的海軍

中校林祥光為駐美國海軍副武官，以分擔我的工作負擔。

寫到這裏，我特別要把一般人所不瞭解的，潘佑強何以要活動做海軍來美接艦千餘官兵的隊長之目的，加以說明。

潘佑強在黃埔第一期同學中，算是相當出鋒頭的人物之一。但他走的不是帶部隊的路線，因此不容易爬上陸軍高層的幾個位置，纔想到向海軍發展。正好海軍派去美國接艦的千餘官兵，需要有一位階級較高的軍官帶領。他認為這是進取海軍的一條捷徑，便活動到手。這個位置，本來是把這批海軍官兵帶到美國的目的地之後就告結束的。但他因為另有目的，就在邁阿密拖了相當時間。到這千餘官兵的工作上了軌道，我與劉田甫武官回華府的時候，他亦祇好跟我們去華府，找機會活動。我因他是陸軍軍官，便把他介紹給戴笠派在華府工作的陸軍副武官蕭勃上校。

原來美國海軍派在重慶工作的海軍武官，因為我國海軍沒有在沿海活動的部隊，亦就沒有情報可供美國海軍。他們就經常向戴笠聯絡，戴笠因此走上了美國海軍的路線。他派在華府的蕭勃上校，就是與美國海軍負責中、日沿海情報的梅爾斯（

MILES）上校（不久就晉升海軍少將）聯絡。從這些微妙的關係，及我與劉武官在離開重慶來美國之前，戴笠特別請我們兩人吃飯，陪客祇有他的副手唐縱一人。當時我並不曉得戴笠為甚麼要請我們吃飯。到這時候我方明白戴笠有意向我國的海軍發展之圖。潘佑強到華府活動，蕭勃不但置之不理，而且請戴笠獲蔣委員長發出要潘立即返國的電令。潘佑強向海軍發展的企圖就此完結。而戴笠則於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因所坐專機失事墜毀而死，纔有黃埔官校第一期出身的桂永清，以陳辭公的副身身分進入海軍的機會。不久陳辭公不兼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乃就地升上去。

一朝天子一朝臣

槍桿關係更換班底

那個時期，我國的政治趨勢，差不多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軍事機關因為有「槍桿」的關係，更是如此。

桂永清到海軍當副總司令時，陳辭公所選拔的五個幹部，周憲章任參謀長，魏濟民任副參謀長，我任海軍官校首長，高如峰任福建及台灣的軍區首長，林祥光任

青島海軍訓練團首長。桂永清升總司令後，把我調到總部擔任主管教育訓練及員額編組的第五署署長，把魏濟民調任海軍官校首長，高如峰則被派去美國，擔任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的中國海軍代表。過了不久，桂就找個藉口把林祥光扣起來，關了一年方無罪釋放。接著藉口海軍官校的學生隊長及學生中，有人投共，就給魏濟民戴上一頂紅帽子，亦扣了起來，關在馬公三年多，一直沒有辦法判他的罪。那時我已經被調回海軍工作，覺得桂這樣做很不合理，乃到陳辭公的官邸去見他，表示魏濟民的案子，不應老是這樣扣著；應該把他調來台北作軍法審判。有罪即判罪，無罪應即釋放。過了不久，魏濟民果被調到台北。軍法審判的結果，是無罪釋放。

至於周憲章，他於從南京隨海總部撤到台北之後，就被桂永清禁閉家中，不給工作，亦不准外出。五人之中，祇有我不但沒有受桂永清打擊，還繼續擔任幾任重要軍職，然後方遭受冷落。因為我有若干其他各人所沒有的因素之故。

原來桂永清入主海軍，亦知道海軍中的主力「中央海軍」，事實上就是福建海軍。他要控制海軍，就得先處置「中央海

「軍」中的主要幹部。陳辭公所任用的五人中，祇有我不但不是中央海軍出身，而且不是福建人。他對海軍完全外行，需要有三幾個月內行人來幫忙他。他知道我有這個條件，便調我到身邊工作。

到三十六年底，宋子文去廣州做綏靖公署主任，他知道那兩年海軍第四軍區司令幾任的人選，都出大毛病。一定要找一位有才能而且廉潔的人來做，方可放心。他打聽到我有這些條件，而且是廣東人，就向桂永清要求派我去做。照一般人的看法，走這條路，不但可升官發財，而且與皇親國戚拉上關係，該有多好。但是我一向對「升官發財」這回事，並不重視。做軍區司令，麻煩事很多，那有做海總署長對海軍的整建多有貢獻，乃向桂永清表示，不如由第三軍區的海軍老前輩黃緒虞少將司令去做更好。桂永清接受我的意見，就調黃司令去廣州，但宋子文不准黃司令接事，並且很快就去南京，面向桂永清要求，非我去做不可，我沒辦法，祇好去做。

從這一事，桂永清知道我這個人。在做官的門路上毫無野心，對我就放心任用，不加防範。一年多後，宋子文離開廣東

，陳辭公就調我去台灣。桂永清考慮了一陣，方纔同意。但拖了兩個多月方放我去。我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任內的時候，陳辭公每週主持軍事首長會議一次，參加的祇有陸、海、空三軍的總司令，孫立人、桂永清、周至柔三人。那時海軍總部在左營，桂永清有時不參加，就叫我替他出席。陽明山革命實踐前幾期，排有三軍首長的報告，桂永清亦都讓我替他去主講，可見桂永清對我也很信任。

後來因海軍一再用運輸艦從香港運了許多不准進口的呢絨等物到台灣，社會上人言嘖嘖，引起監察院、立法院都起來質問，因此陳辭公對桂永清很不高興。桂知道陳辭公對我很信任，他一方面怪我沒有在陳辭公面前為他緩頰，另一方面怕我會威脅到他的地位，乃利用軍政長官公署的軍事部門併入國防部的機會，把我調去國防部擔任屬於「冷門」的「戰略研究委員會」工作。因此我就被閒散起來了。這是我在海軍服務二十年中，因與陳辭公發生關係而受的第一次打擊。看起來，這次打擊似乎不輕，但比起第二次的打擊，就顯得輕得多，因為第二次打擊我的人蔣經國之故。

第二次打擊

陳蔣交惡傷及無辜

說起來亦奇怪。我與蔣經國曾經同班受訓過。我是他認識的第一個海軍軍官。那是抗日戰爭期間的民國二十八年，我們倆同時入位於重慶郊區的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期受訓。受訓期限是五個星期。全班學員約三百人，編成一個大隊。大隊長是王東原中將，但他對外場勤務，總是每天從學員中挑選一名成績較好的出來執行。我被挑過。蔣經國雖然在國內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但因為他的背景特殊，所以亦被挑出來，而且我就從他手中接過大隊長的標帶。我們年紀相當（我比他大兩歲），所以很談得來，受訓結業以迄抗戰勝利這六年中，我與蔣經國就沒有再見過面。

勝利後，我先後擔任海軍官校首長，海軍總部第五署署長等工作。一則在職務上與他毫無關係，再則我一向沒有走熱門高官門路的習慣，當然亦就沒有去走有「太子」身分的蔣經國的門路。

政府遷到台北之後，蔣經國就在軍中

成立「總政治部」。桂永清自恃他是黃埔一期出身的老大哥，蔣總統的學生，就不買蔣經國的賬。蔣經國乃利用海軍中他的人手，找出桂永清的一些毛病，一狀告到蔣總統那裏，就把桂永清給告下去。原來海軍的副總司令馬紀壯，參謀長黎玉璽，就都各進一步，成為總司令及副總司令。馬紀壯是東北的海軍官校出身，比我晚畢業三年，他畢業前，我做過他的教官。因此他乃把我從國防部的冷板凳上調到海軍總部任副參謀長，兩年後調任第二艦隊司令。

我在海軍中工作，十分努力，相當認真，而且不貪污，所以表現得很好，那時候海軍高級人物中，有些出身派系不同，學術能力很差，但專門走政工路線，在升官發財上動腦筋的，都討厭我，想把我擠開，就對蔣經國說，我是陳辭公的人。蔣本來對我沒有走他的門路，就有點懷疑。經這些人這麼一說，他就相信。乃叫這些人去找我的毛病，好下手整我。這些人知道不可能找到我的毛病，乃乘我去大陳前線指揮海軍的機會，編出一套假資料：把我唯一的一次，離開旗艦去找大陳防衛司令劉廉一中將，商討他對海軍運用的規定

這一行動，說成我「跑到岸上去躲空襲」。這一個報告，由海軍政工路線經蔣經國呈給蔣總統。他看後非常生氣，就批給當時的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從嚴處分我。彭孟緝上將知道這個報告可能有問題，乃一再建議記我兩次大過，都被批「太輕」。彭沒辦法，祇好將此案暫時擱在一邊。我知道此中的關鍵，乃於蔣總統照規定須要召見我的機會，寫好一份報告，說我每逢大陳前線緊張的時機，就自動申請前去指揮海軍。請總統詢問這兩年的海軍總司令馬紀壯及梁序昭，就可證明我這說法。我絕不會有貪生怕死的行為。我將這報告當面呈給總統。

過了幾天，彭孟緝又把我那個案呈上去，被批「記小過一次」結案。這一來對蔣經國多少有點難看，他因此對我更不滿意。從此海軍就好些年沒有給我派職。後來他從各方面探知我的為人並不像他所想像那樣，乃讓我進參謀總部的人事部門做助理次長，這時我已經接近退休的年齡了。

結語

旁敲側擊歷史見證

我對於因曾經追隨過陳辭公致遭打擊一事，向來不願意敘述，尤其是受蔣經國壓迫那些經過，更是如此。但於閱讀吳錫澤先生所寫「我追隨陳辭公的回憶」後段「過去一般皆以為是最親信之部屬，至是皆裹足不來。過去唯恐不能接近，現則唯恐保持距離不遠。……或為了確保現有之職務，而搶先靠攏」之後，覺得吳錫澤這番觀感，固是實情，但人的操守每有超出常情之處。

我在海軍工作四十年，一向都不重視「升官發財」，而努力把目前工作做好為目標。這與那個時期的官場作風並不一致。我如果能對蔣經國敷衍一些，就不致惹得那些煩惱。可見我不但是吳錫澤所說「搶先靠攏」的人，而且是本來就有點關係而不去利用的笨伯。我寫本文的目的，就在表明「事有超出常情」這一點上。我目前已年逾九十（我是一九〇八年出生的），當年在台灣政治舞台上活躍的人物，都早已逝世。今天，把我這些經驗盡量節約地寫出來，給歷史做個旁敲側擊的見證，應該還是有點意思罷。